

历史·文化

## 孟加拉国<sup>①</sup>泰戈尔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杨伟明

**摘要：**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年）是世界级文学天才和思想巨匠。一百多年来，泰戈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翻译出版，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世界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中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入的当属泰戈尔的母语地区——孟加拉语地区的泰戈尔研究。从东孟加拉到东巴基斯坦再到独立后的孟加拉国，泰戈尔的研究也由于政治、文化、宗教等原因经历了很多的跌宕起伏。泰戈尔曾被认为是“印度文化的继承者”而被巴基斯坦禁止。印巴分治十几年间，泰戈尔研究主要都局限在“少数开明的文学家和数量庞大的宗派主义者”之间的“泰戈尔论争”中。1961年围绕泰戈尔的百年诞辰，东巴基斯坦的整个文化阶层和政府对立。泰戈尔也逐渐成为孟加拉文化的旗帜，激励了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语言和文化政治运动，成为激励孟加拉国独立的精神源泉。孟加拉国独立后，关于泰戈尔的相关性的争议又起，开始了对泰戈尔重新发现和研究的过程。梳理孟加拉国的泰戈尔接受史对于我国的泰戈尔研究，对于加强中孟、中印文化交流与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泰戈尔；孟加拉国；接受史；文学；文化交流

**来稿日期：**2020-10-27

**作者简介：**杨伟明（198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博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洲非洲地区语言节目中心孟加拉语部副译审，研究方向：泰戈尔、孟加拉语言文化。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作品被世界各个国家翻译成很多语言并获得广泛的传播。世界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中最丰富、最全面、最深入的当属泰戈尔的母语地区——孟加拉语地区的泰戈尔研究。孟加拉语地区不仅是泰戈尔个人成长和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土壤，也是对他的语言风格、作品内涵、宗教思想、美学思想和艺术思想了解最全面的地区。泰戈尔的影响遍布整个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小学每

---

<sup>①</sup> 1947年印巴分治，孟加拉被划分为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西孟加拉邦和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巴基斯坦即后来的孟加拉国。本文即以东巴基斯坦以及独立后的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

个年级的课本中几乎都收录了泰戈尔的作品；孟加拉国的国歌《金色的孟加拉》是泰戈尔创作的；首都达卡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播放泰戈尔歌曲，有百余家从事泰戈尔音乐教育和研究的机构；泰戈尔的戏剧也是达卡各大剧团和演出团体长盛不衰的节目；泰戈尔诗歌朗诵也是各种文化活动中的常见节目；每年泰戈尔的诞辰和忌日都会举行关于泰戈尔的研讨会和文化活动；更有无数的机构、文化节目、报纸专栏和书店以泰戈尔作品中的人物或作品集的名字命名。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也曾数次出现过“泰戈尔论争”，他被崇拜过，被捧上过神坛，也被批评过、拒绝过。

泰戈尔对于孟加拉国的文化界来说至今都是一个“文化标志”。作为说孟加拉语的东巴基斯坦人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泰戈尔，作为“文化反抗精神领袖”的泰戈尔，在孟加拉国独立前和独立后他的地位如何？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中泰戈尔如何融入和影响当地人的生活？本文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试图解释这些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一、泰戈尔研究的起步（1947年之前）

如同孟加拉国泰戈尔研究学者格拉姆·穆尔希德在他的《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中的东孟加拉》中所说：“直到印巴分治之前，孟加拉语言和文学的中心都在加尔各答，那时大部分的文学家和文学读者都是印度教徒。”<sup>①</sup>1947年之前的东孟加拉地区基本是乡村社会，大部分人从事农业劳动，且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当时东孟加拉地区的识字率很低，在分治不久后的一份人口调查中显示，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中仅有11.77%的人接受过教育。<sup>②</sup>196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东巴基斯坦仍有82%的人是文盲。<sup>③</sup>但分治之后很快，曾在加尔各答工作的穆斯林文学家和文学人士纷纷来到东巴基斯坦首都达卡。就这样，原来就在达卡居住的文学人士、从西孟加拉邦过来的文学人士，还有当地对文学感兴趣的教师学生等日后慢慢形成达卡文学圈，正是他们掀起了之后相关的文化运动。

直到1914年，<sup>④</sup>穆斯林作家写的第一本关于泰戈尔的书才出现。艾格拉姆·乌丁（Ekram Uddin）写了评论泰戈尔戏剧《牺牲》的著作《泰戈尔的天

---

① Ghulam Murshid, *Rabindramanas O Sristikarme Purbobango*, Dhaka:OBOSAR, 2015, p.174.

② Ibid., p.182.

③ 威廉·冯·申德尔著，李腾译：《孟加拉国史》，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58页。

④ 关于此书的发表时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1914年，发表于1926年；而有的学者认为此书发表于1914年。笔者依据穆赫穆德·阿卜杜尔·海伊创作的《孟加拉文学史》1989年第七版所记录此书的创作年代进行引用。

赋》( *Rabindra-Pratibha* )。①文学家穆罕穆德·阿卜杜尔·海伊认为：“这是对《牺牲》话剧中泰戈尔天赋表示认可的第一部评论作品。”②虽然该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是作为第一本关于泰戈尔创作的研究文献值得一提。1927年孟加拉地区知识分子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卡齐·阿卜杜尔·奥杜德( Kazi Abdul Wadud )写的著作《读泰戈尔的诗——追寻内心发展的轨迹》( *Rabindra Kabbopath-Manobikasher Dharar Anusoron* )出版。泰戈尔还写信给他，对他的文章表示赞扬：“对我的作品进行这么有意思的评论的文章，我以前还没有读到过。这其中表达的细腻的情感和娴熟的语言技巧也令人惊讶。能得到你这样的读者对于诗人来说是很荣幸的事……”③在印巴分治之前，还有一本关于泰戈尔的书值得一提。就是诗人格拉姆·穆斯塔法( Golam Mostafa ) 1946年写的《伊斯兰教和泰戈尔》( *Islam O Rabindranath* )，但这本书仅限于泰戈尔作品中跟伊斯兰教相关内容的讨论。

## 二、“摒弃还是接受”的阶段( 1947~1960年 )

回顾东巴基斯坦1947~1960年期间泰戈尔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时的泰戈尔研究主要限于宗派主义集团对泰戈尔研究打压和非宗派主义团体在这种攻击中对泰戈尔保护的 efforts 中。

### 1. 充满争议的泰戈尔研究

根据孟加拉语学院1986年泰戈尔诞辰125周年出版的《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作品目录( 1947~1985年 )》，1947~1960年间东巴基斯坦仅有一本关于泰戈尔的专著问世，是1960年出版的卡耶鲁尔·巴沙尔的《诗圣泰戈尔》。④这段时间不同的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泰戈尔相关文章大概有117篇。

孟加拉国泰戈尔研究学者格拉姆·穆尔希德在他的《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中的东孟加拉》中总结道，印巴分治十几年间，泰戈尔研究主要都局限在“少数开明的文学家和数量庞大的宗派主义者”之间的“泰戈尔论争”中。⑤这论争的一方是泰戈尔的拥护者，他们认为泰戈尔是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孟加拉文化的标志人物；而反对泰戈尔的人从宗派主义出发，认为泰戈尔和巴基斯坦的国家理念以及文化传统是相悖的，应该抛弃。

① Bhuiya Iqbal, *Rabindranath O Musalman Samaj*, Dhaka:PROTHOMA, 2010, p.52.

② Muhammad Abdul Hay, Syed Ali Ahsan, *Bangla Sahityer Ittibritto*, Dhaka: Ahmad Publishing House 1989, p.176.

③ Bhuiya Iqbal, *Rabindranath O Musalman Samaj*, Dhaka:PROTHOMA, 2010, p.54.

④ Khayrul Bashar, *Kabiguru Rabindranath*, Dhaka: PRAKASH, 1960.

⑤ Ghulam Murshid, *Rabindranath O Sristikarme Purbobango*, Dhaka:OBOSAR, 2015, p.182.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文化氛围相关。1947年印巴分治，孟加拉也被划分为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西孟加拉邦。同年11月西巴基斯坦的精英们主张以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语言，而没有把使用人口占整个巴基斯坦56%的孟加拉语作为国家语言。西巴基斯坦“强制推行乌尔都语是‘伊斯兰教化’东巴基斯坦任务的一部分。许多西巴基斯坦人对孟加拉语所知甚少，却认为需要‘净化’其中的印度教影响。对他们来说，孟加拉文字（从梵文演化而来）、孟加拉语中的梵文词汇和印度教徒在孟加拉文学经典中的统治地位是令人厌恶的”。<sup>①</sup>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巴基斯坦当局打压泰戈尔研究的态势，把泰戈尔从课本中删除，还禁止在电台播放泰戈尔歌曲。

当时的文化运动也体现了这种政治诉求。东巴基斯坦以达卡为中心逐渐开始的文学和文化运动形成对立的两派。其中一派是占大多数的有强烈宗派主义思想的诗人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在宗教认同基础上成立的巴基斯坦的“统一性”，认为应当摒弃孟加拉语文学中的那些“印度教因素”，他们倡导要改革孟加拉语的书写体系，甚至认为出生于印度教家庭的泰戈尔也是需要否定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泰戈尔是印度传统的继承者，而这个传统对穆斯林孟加拉人来说没有任何益处”。<sup>②</sup>

与“相信巴基斯坦理想”和“保持穆斯林文化独立性”的那些知识分子相对的还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孟加拉人主义”比“穆斯林主义”更重要。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他们是较为理性的和开放的。看到那些对泰戈尔歪曲的观点他们逐渐开始反抗。他们以月刊《无奈》（*Agatya*），《伊姆罗兹》（*Imroz*），《魅力》（*Dilruba*）等为阵地传播自己的非教派开明思想。他们的泰戈尔研究主要围绕“泰戈尔是东巴基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主题。因此这段时间很多泰戈尔研究的作品都是强调泰戈尔和东巴基斯坦联系的，比如在东巴基斯坦有泰戈尔的祖产，他曾在这里生活过，他的作品受东孟加拉地区生活经历的影响等等。还有些学者试图寻找泰戈尔身上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影响，以及哈菲兹和伊克巴尔等伊斯兰教诗人与泰戈尔的共鸣等。还有作家分析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认为他信仰开明的“人的宗教”。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无法对当时东巴基斯坦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 2. 左翼人士“资本主义反动作家”的指责

1948年达卡监狱中的部分左翼人士，受西孟加拉邦共产主义左翼人士影响，用机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泰戈尔是反动的资本主义作家。他们认为在他

<sup>①</sup> 威廉·冯·申德尔著，李腾译：《孟加拉国史》，东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113~114 页

<sup>②</sup> Ghulam Murshid, *Rabindranas O Sristikarme Purbobango*, Dhaka:OBOSAR, 2015, p.183.

们要实现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泰戈尔文学没有任何贡献。这种思想在共产主义人士内部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大部分共产主义人士并不支持这种观点。陀农焦伊·达斯（Dhonojoy Das）在他的《我的故乡：充满回忆的孟加拉国》（*Amar Jonmohumi: Smritimoy Bangladesh*）中说，大部分共产主义人士不同意用极左思想的理论来评价泰戈尔。他们结合其生活的历史背景，都认可泰戈尔的进步性并认为他是孟加拉传统的一位伟大继承者。<sup>①</sup>

1948年在苏里穆拉穆斯林宿舍（Solimullah Muslin Hall）举行的文学集会上，达卡的进步作家协会（Bangladesh Pragati Lekhak Sangha）的几个左翼人士，穆尼尔·乔杜里（Munier Choudhury）、阿卜杜拉·阿尔·穆迪（Abdullah Al Muti）和阿克拉古尔·拉赫曼（Akhlakur Rahman）将泰戈尔称为资本主义者和反动作家。阿克拉古尔·拉赫曼引用泰戈尔的《印度朝圣者》（*Bharattirtha*）的诗句“今日开启西部的大门，人人送来丰富的礼品，赠纳，溶解，无一回遁，在这印度巨人的海滨”<sup>②</sup>以此证明泰戈尔代表帝国主义英国宣称对印度的所有权，并认为在文学领域泰戈尔是反动的。他用激烈的话语抨击泰戈尔的文学。穆罕默德·沙希杜拉（Muhammad Shahidullah）和协会的主席奥吉多古哈（Ajitguha）对此表示反对。主席奥吉多古哈引用泰戈尔文学中的内容证明泰戈尔是进步的。<sup>③</sup>

东巴基斯坦共产党1948年3月刚刚成立。当时的孟加拉国达卡的左翼进步作家中的这种争论是受西孟加拉邦共产党内部争论的影响。加尔各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者》（*Marxbadi*）报纸上曾刊登过这些左翼作家的文学观点：“那些没有对被压迫人民表达支持，对未来社会没有指向的文学，他们认为是完全可以抛弃的……从拉姆莫汉到泰戈尔，所有19世纪的作家自身创造了革命资产阶级，因此是可以抛弃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五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奥义书》的唯心主义是泰戈尔哲学的灵魂。这种哲学是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最有力的工具。在让劳动阶级忘记阶级斗争的努力中，资产阶级都没能发现这么有力的工具。……泰戈尔一生创作的东西，在阶级斗争中都是反动阵营的力量，进步阵营要想前进就要完全否认泰戈尔。”<sup>④</sup>

<sup>①</sup> Shamsuzzaman Khan, “Bangladeshe Rabindra–Bitorko O Tar Kichu Tika–Bhassho”, Mustafa Majid ed., *Mugdho O Muktdarishitir Rabindra–Bitorko*, Dhaka: Maula Brothers, 2012, p.325.

<sup>②</sup> 《吉檀迦利》第106首，白开元译，董友忱校，董友忱主编：《泰戈尔作品全集》（第6卷上），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

<sup>③</sup> Badruddin Umar, *Purba Banglar Bhasha Andolon O Tatkalin Rajniti*, Volume 1, Kalkata: Anandadhara, 1970, pp.176~177.

<sup>④</sup> Subir Ray Chowdhury, “Marxbadi Rabindra–Samalochanar Itihas”, *Notun Sahitya*, Dhaka:Boishakh–Ashar Edition, 1366, p.150.

这些极左言论的背后有当时印度共产党的宣传策略的影响在里面。在当时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背景下，在罗诺迪瓦（Ranadibhe）和婆巴尼·森（Bhabani Sen）等人的领导下印度共产党有“左倾”主义倾向。而这段时期共产党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的动荡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泰戈尔研究。东巴基斯坦的那些想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进步作家知识分子也在这种影响下对泰戈尔发表了极端的言论。但是当时这些争论仅仅局限在东巴基斯坦左翼人士内部，并没有在人民大众中产生广泛影响，报纸杂志中也很少见。

### 3. 宗派主义文学家“摒弃泰戈尔”的要求

1940年“拉合尔决议”的通过和之后的“巴基斯坦运动”展开的背景下，带着对即将成立的建立在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国家的热情，整体上来说当时东巴基斯坦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在孟加拉语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形成自己的穆斯林特色，使其与印度教徒的语言、文学文化区别开来。1947年“分治后，东巴基斯坦和达卡开始的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具有极端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sup>①</sup> 他们的这种思想和价值观体现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反应在“东巴基斯坦文学协会”（Purba Pakistan Sahitya Sangsad）和“东巴基斯坦文艺复兴学会”（East Pakistan Renaissance Society）等组织的活动中。

1943年“东巴基斯坦文学协会”年会在苏里姆拉穆斯林学生宿舍举行。协会的主席索耶德·萨贾德·侯赛因（Syed Sazzad Houssain）在年会发言中指出：“如同爱尔兰文学运动一样，孟加拉语中穆斯林们也应当开创自己独立的流派。”<sup>②</sup> 1944年在加尔各答的伊斯拉米亚学院（Islamiya College）举行的“东巴基斯坦文艺复兴学会”年会中相关学者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相似的要求。当时著名的诗人作家格拉姆·穆斯塔法（“东巴基斯坦文艺复兴学会”成员）也表示“终将有一天，东孟加拉的语言将是伊斯兰化的孟加拉语”。<sup>③</sup>

文学家索耶德·阿里·阿赫桑（“东巴基斯坦文艺复兴学会”成员）1951年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必须要记住，巴基斯坦是在独立自主意识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独立自主也要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中表现出来。因此旧孟加拉的文化传统不能继承……为了新国家的稳定，我们要在自己的文学中寻找新生活和新思想。为了保持我们文化的自主性和国家的团结，就算是泰戈尔我们也准备不予承

---

① Muhammad Abdur Razzak, *Bangladesher Rabindracharcha: Rachanapanji*, Dhaka: Bangla Academy, p.69.

② Sardar Fazlul Karim ed. *Pakistan Andolon O Bangla Sahitya*, Dhaka: Bangla Academy, 1968, pp.107-111.

③ Golam Mostafa, “Bangla Sahityer Rapayane Islamer Prabhab”, *Golam Mostafar Prabondho Sangkalon*, Dhaka: Ahmad Publishing House, 1968, p.229.

认。”<sup>①</sup>

政府和文学界对孟加拉语言和文学的极端宗教化努力使得那些开明和理性的文学家和文化人士慢慢开始抗拒。1948~1952年的语言运动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大的力量，其背后就是这种反抗情绪在起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声音却很微弱。

1948年12月31日至1949年1月1日在达卡举行的“东巴基斯坦文学会议”上穆罕穆德·沙希杜拉说道：“我们确实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但比这更高的真实是我们是孟加拉人。这并不是理想，而是现实。自然母亲用自己的手给我们的面容和孟加拉语言打上了印记，这并不是通过佩戴的项链、额头的印记、发髻或者帽子、围裤就能遮盖的。”<sup>②</sup>

### 三、“泰戈尔成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地位的确立（1961~1971）

1961年围绕泰戈尔百年诞辰争论升级，报纸展开论战，普通民众第一次广泛关注泰戈尔。围绕泰戈尔孟加拉地区人民的文化觉醒和政治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1967年6月拥护泰戈尔的文学、知识分子与东巴当局与之间产生对抗。1967年“伟大诗人纪念日”活动中正式把泰戈尔认可为东孟加拉人民的诗人。泰戈尔成为促使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胜利的精神力量。60年代末，东孟加拉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泰戈尔研究开始增加。

#### 1. 真正意义上泰戈尔研究的发展

1961年围绕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东巴基斯坦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为这个时代打上了浓重的印迹。根据穆罕穆德·阿卜杜尔·拉扎克编辑的《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作品名录（1947~1985年）》，<sup>③</sup>以及莫妮拉·卡耶斯所著《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评价的变化》<sup>④</sup>等资料所显示，在孟加拉国独立前（1961~1970年）9年间至少出版了13本关于泰戈尔的专著，关于泰戈尔的各类文章至少有435篇。巴基斯坦时期出版的这些专著为孟加拉国独立后的泰戈尔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时期的泰戈尔研究，学者桑吉达·卡顿总结道：“有些作品表达了

---

① Syed Ali Ahsan, “Purba Pakistaner Bangla Sahityer Dhara”, *Mahe Nao*, August 1951, pp.53~54.

② Syeed-ur Rahman, *Purba Banglar Rajniti-Sanskriti O Kabita*, Dhaka: Dhaka University, 1983, p.35.

③ Muhammad Abdur Razzak, *Bangladesher Rabindracharcha: Rachanapanji*,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6, pp.145~146.

④ Manira Kayes, *Bangladeshe Rabindracharcha Mullayoner Rupantar*,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9, p.138.

自己对于泰戈尔的感受，为了唤起其他人对泰戈尔的好奇。还有很多人在真诚中加入了对其他人的安慰的愿望。这就是——泰戈尔是东孟加拉的人，或者是在这片土地上管理田产的时候写作的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对他心理世界的塑造以及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西孟加拉邦的人。他们害怕如果得不到这样的安慰，人们会把泰戈尔看作外国的诗人，就像政府希望的那样。”<sup>①</sup>

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学界不仅仅局限在争论泰戈尔是否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的讨论中，而是开始关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文学作品、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以及泰戈尔的生平传记等内容。这是真正的泰戈尔研究的发端，也为今后泰戈尔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2. 成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

泰戈尔研究学者格拉姆·穆尔希德在他的《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中的东孟加拉》一书中说道：“在伊斯兰教派势力和政府的打压下，热爱泰戈尔的人甚至文学爱好者，不管他们读过多少泰戈尔，都带着反抗压迫的热情开始研究泰戈尔。……泰戈尔一百周年诞辰在达卡如此热烈地庆祝，背后也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sup>②</sup>

1961年围绕泰戈尔百年诞辰争论升级，报纸展开论战，普通民众第一次广泛关注泰戈尔。穆罕默德·阿克拉姆·汗（Mohammad Akram Khan）主编的《阿扎德》报纸（*Azad Patrika*），从孟历白沙克月（孟历第一月，公历4~5月）12号到杰斯塔月（孟历第二月，公历5~6月）1号连着21天发表各种攻击泰戈尔的言论。其主编也是伊斯兰教领袖的穆罕默德·阿格拉姆·汗写道：“他从没以同情的眼光看待1亿穆斯林人，而是让他们沉到想象的无底深渊，要瓦解他们。在提到穆斯林的名字时，就没有了通常的礼貌，而是无论如何都要加上一些表达厌恶的形容词。他也被印度这个古老的传统影响了。”<sup>③</sup>

另一方面相反，《团结报》（*Daily Ittefaq*）和《新闻报》（*Daily Sangbad*）支持和肯定泰戈尔。他们针对《阿扎德报》的每一篇文章，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并试图展示一个原本的真实的泰戈尔。

尽管有军事政府的高压政策，进步的艺术、文学和文化界人士照样庆祝了泰戈尔的百年诞辰。在法官马赫布卜·穆尔谢德（Mahbub Murshed）和诗人苏

---

<sup>①</sup> Sanjita Khatun, “Rabindracharcha O Bangladesh”, *Rabindranath: Bibidh Shondhan*,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4, p.138.

<sup>②</sup> Ghulam Murshid, *Rabindramanas O Sristikarme Purbobango*, Dhaka: OBOSAR, 2015, p.185.

<sup>③</sup> *Ibid.*, p.191.



菲亚·卡马尔 (Sufia Kamal) 的主持和带领下, 开明文学人士联合在达卡举办了长达七天的庆祝活动。1961年百年诞辰庆祝活动中, 泰戈尔第一次在东孟加拉人的心中具有了生命力。作为文化和政治符号, 泰戈尔成为激励东孟加拉独立的力量。围绕泰戈尔, 孟加拉地区人民的文化觉醒和政治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

1967年围绕泰戈尔的争论再次变得激烈。1967年6月25日在达卡大学孟加拉语系的带领下18位文学、艺术领域的教师和知识分子联名在《巴基斯坦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抗议: “……我们认为政府媒体禁止或减少播放泰戈尔歌曲是非常让人痛心的。泰戈尔的文学为孟加拉语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的歌曲在表达我们深沉和细腻的感情方面所做的贡献, 使泰戈尔成为说孟加拉语的巴基斯坦人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必须考虑并尊重这一事实。”<sup>①</sup> 另一方面, 达卡大学包括索耶德·萨贾德·侯赛因 (Syed Sazzad Hossain) 在内的五位老师针对这个声明进行了反驳。他们又联合了达卡的40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支持政府反对泰戈尔的宣言。

1967年孟历斯拉万月 (孟历第4月, 公历7~8月) 泰戈尔的忌日时, 所有文化团体联合组织了3天的活动。之后政府不得不取消了有关泰戈尔的禁令。1967年7月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协会 (Writers' Guild) 举办的“纪念伟大诗人的活动”中, 将泰戈尔与其他作家如伊克巴尔、迦利布、纳兹鲁尔和迈克尔等著名诗人一样给予认可。在孟加拉国独立之前, 泰戈尔最终在文化界获得了正式的认可, 泰戈尔被认可为东孟加拉人民的诗人。1969年的民众起义和1971年的解放战争中, 泰戈尔成为东孟加拉人争取文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面旗帜。

#### 四、泰戈尔研究的转向——重新发现 (1971年至今)

20世纪80年代, 孟加拉国泰戈尔研究褪去了对“泰戈尔光环”的崇拜和迷恋, 开始理性地学术分析和评价。这个阶段泰戈尔研究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宗教宗派主义反对泰戈尔的声音逐渐远去, 那些曾反对泰戈尔的人转而成为泰戈尔的支持者; 开始关注泰戈尔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开始发掘泰戈尔的历史局限性。

##### 1. 对泰戈尔的重新发现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界对泰戈尔的著作、书信等进行综合整理, 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对于泰戈尔生平及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综合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也被广泛应

---

<sup>①</sup> Shamsuzzaman Khan, “Bangladeshe Rabindra-Bitorko O Tar Kichu Tika-Bhassho”, Mustafa Majid ed. *Mugdho O Muktdarishtir Rabindra-Bitorko*, Dhaka: Maula Brothers, 2012, p.330.

用。一些学者将泰戈尔放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进行思考。

根据穆罕穆德·阿卜杜尔·拉扎克编辑的《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作品名录（1947~1985年）》，<sup>①</sup>以及莫妮拉·卡耶斯所著《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评价的变化》<sup>②</sup>等资料所显示，1971年到1985年14年间共出版了关于泰戈尔的34本书和777篇文章。<sup>③</sup>从这个统计数据能清晰地看出泰戈尔研究增长的气势。这些书中也包括大学的研究生论文和博士论文。国家机构孟加拉研究院1971到1990年19年中出版了泰戈尔相关图书21本，之后的25年中出版的泰戈尔著作大约30本。<sup>④</sup>这当中很多还是在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庆时出版的。其他的非政府出版社除了出版泰戈尔研究的文章外，也出版泰戈尔比较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 2. “泰戈尔文学相关性”的论争

1971年独立后的孟加拉国对于泰戈尔的论争还没有结束，只是论争的内容发生了改变。1972年5月10日《缤纷》（*Bichitra*）周刊提出的问题引发了关于泰戈尔新的讨论。《缤纷》杂志向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孟加拉国的独立战争中一个重要的鼓舞人心的力量是泰戈尔。泰戈尔曾是我们战争的武器。今天在独立的孟加拉国泰戈尔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成为激励我们斗争的动力？还是他渐渐从斗争的观念中消失了？”<sup>⑤</sup>

高比尔·乔杜里（Kabir Chowdhury）教授认为泰戈尔在时代改变的背景下仍然是人民斗争的动力。泰戈尔思想中对于善和美的思想价值是永恒的不会消失的。他写道：“不，泰戈尔从来没有从我们的斗争观念中消失，相反在激发善的观念和各种美的观念中泰戈尔会一直永不褪色地存在。……泰戈尔是普通大众的诗人，是超越时代的诗人。独立前他曾起到的作用，在现在的文化领域中这作用会更加清晰。他斗争的语言，歌曲中隐藏的诉求会扩散开来。独立前他的影响，在独立后的每一天中都将会更加广泛。”<sup>⑥</sup>

记者阿卜杜尔·戈法尔·乔杜里（Abdul Gafar Chowdhury）说：“独立战争之前，‘泰戈尔’这个名字是孟加拉国文化反抗的基础。文化反抗中诞生了政治

---

<sup>①</sup> Muhammad Abdur Razzak, *Bangladesher Rabindracharcha: Rachanapanji*,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6, pp.145~146.

<sup>②</sup> Manira Kayes, *Bangladeshe Rabindracharcha Mullayoner Rupantar*,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9, pp.143~144.

<sup>③</sup> Muhammad Abdur Razzak, *Bangladesher Rabindracharcha: Rachanapanji*, Dhaka: Bangla Academy, 1986.

<sup>④</sup> 根据孟加拉研究院的出版目录统计。

<sup>⑤</sup> Shamsuzzaman Khan, “Bangladeshe Rabindra–Bitorko O Tar Kichu Tika–Bhassho”, Mustafa Majid ed. *Mugdho O Muktdrishtir Rabindra–Bitorko*, Dhaka: Maula Brothers, 2012, p.330.

<sup>⑥</sup> Manira Kayes, *Bangladeshe Rabindracharcha Mullayoner Rupantar*,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9, p.120.

革命，这个革命的武装也是泰戈尔文化。泰戈尔文化和孟加拉文化基本是一样的。……获得独立后，也就是孟加拉人的民族主义抗争胜利之后，自然地泰戈尔意识会从全体的意识转换成为个人的意识，而他的文学将会被永恒不变的试金石去进行评价。因此泰戈尔受欢迎的人民基础慢慢会转化成个人基础，这也很正常。”<sup>①</sup>

文学家阿尼斯·西迪吉（Anis Siddiqi）说：“孟加拉的普通人永远会真心尊敬泰戈尔但不能全心热爱他。家庭出身，生活环境，以及高超的诗人天赋让泰戈尔能够在世界文学中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地位，但是孟加拉的普通人却触碰不到他……人们不能将他看作自己人，他的观点和智慧停留在人们可感知的界限之外，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人们斗争的激励之源呢？……因为孟加拉国是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努力工作的人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泰戈尔文学现在都是不熟悉的。”<sup>②</sup>

《缤纷》引起的这个争议在1973年又升级了。泰戈尔诞辰庆祝之际，孟加拉国家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教育家艾哈迈德·沙里夫（Ahmad Sharif）教授说：“泰戈尔不是我们的传统和财富，而且他的文学现在已经不能成为我们激励的源泉了。”<sup>③</sup>艾哈迈德·沙里夫教授的这个观点在孟加拉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泰戈尔文学的支持者们开始写各种文章反对这个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泰戈尔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情绪感受里面。抛弃他的观点让我们深感焦虑不安”。<sup>④</sup>

之后1986年艾哈迈德·沙里夫博士再次引发了争论。泰戈尔125周年诞辰之际孟加拉研究院出版的《传承》（*Uttaradhikar*）杂志上发表了沙里夫博士写的《泰戈尔后第三代人的泰戈尔评价》（*Rabindrauttor Tritiyo Prajonmer Rabindra Mullayon*）一文再次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之后一段时间，这个争议的潮流都在延续。

这段时期关于泰戈尔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泰戈尔和普通民众的关系，泰戈尔是否是资产阶级作家，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他是否轻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和孟加拉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关。总体来说，随着泰戈尔研究的深入，人们在承认泰戈尔局限性的基础上对泰戈尔的评

---

<sup>①</sup> Manira Kayes, *Bangladeshe Rabindracharcha Mullayoner Rupantar*, Dhaka: Bangla Academy, 1999, p.121.

<sup>②</sup> *Ibid.*, p.123.

<sup>③</sup> Shamsuzzaman Khan, “Bangladeshe Rabindra-Bitorko O Tar Kichu Tika-Bhassho”, Mustafa Majid ed. *Mugdho O Muktaadrishtir Rabindra-Bitorko*, Dhaka: Maula Brothers, 2012, p.339.

<sup>④</sup> *Ibid.*, p.339.

价越来越客观，对泰戈尔超越时代的思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 五、孟加拉国泰戈尔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孟加拉国泰戈尔接受史的梳理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是对我国泰戈尔学研究的一次崭新尝试，对于东方文学学科和世界文学学科的建设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印、中孟文化交流以及构建“亚洲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为我国的泰戈尔研究提供一个横向比较的参照

一百五十多年来，泰戈尔的作品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翻译出版，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世界各国对他的研究日渐形成一门坚实厚重的“泰学”（Tagore studies），与世界上早已有之的“莎学”（莎士比亚研究）、“浮学”（歌德的《浮士德》研究）和“红学”（《红楼梦》研究）等鼎足而立。

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泰戈尔在各国的百年接受史也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对泰戈尔的评价也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其中也加入了很多政治和社会的因素。20世纪的亚洲和拉美国家正经历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泰戈尔的作品中表达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使他被作为民族运动的“一面旗帜”而被“利用”。印度著名泰戈尔研究学者乌玛·达斯·古普达（Uma Das Gupta）等编著的《泰戈尔百年世界接受史》中提道：“有个很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泰戈尔的声音不仅被某种特定的思想阵营或某种政治诉求的人所听到，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被政治、社会、宗教和艺术团体的人所‘利用’，而且有时还是‘滥用’。他被封为各种运动的‘偶像’，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民族主义和亲自由、亲团结和支持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理念的‘偶像’。”<sup>①</sup>通过学术史研究，对孟加拉国的泰戈尔研究进行梳理，厘清源流，分析原因，展示问题，总结泰戈尔研究的发展规律和臧否得失。

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也成为世界泰戈尔研究花园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学者在各个时期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研究层出不穷，在各个层面对泰戈尔都有所挖掘探索。“21世纪初，刘安武主编的24卷本《泰戈尔全集》和2016年董友忱主编的33卷的《泰戈尔作品全集》的出版可以说标识着泰戈尔研究成为印度佛教研究之后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另一个‘显学’，或者说在‘印度语世界的泰戈尔’和‘英语世界的泰戈尔’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中文世界的泰戈尔’。无疑，中文世界的泰戈尔是中国的创造，是中国对印度文化的吸收和贡献，也是中印两大文

---

<sup>①</sup> Martin Kämpchen, Imre Bangha, Uma Das Gupta: *Rabindranath Tagore: One Hundred Years of Global Reception*, New Delhi: Orient Blackswan Private Limited, 2014, Preface Px.

明关系的和谐体现。”<sup>①</sup>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作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陈众议所说：“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sup>②</sup>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应该和世界泰戈尔学界保持更进一步的密切联系，把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把世界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目前国内的泰戈尔研究基本局限在国内的语境，对泰戈尔在孟加拉语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借鉴明显不足。今后的泰戈尔研究可以试着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加以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分析泰戈尔对于孟加拉地区的实际影响，这可以为东方经典作家作品在本土语境的学术史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 2. 有助于加强中印、中孟文化交流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涉及沿线国家众多，语言文化各异。深入研究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需求大大增加。“一带一路”的贯通更是民心的相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在于对于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只有在理解和信任增强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更加顺畅的交往以及更加友好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说：“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中国和孟加拉地区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孟加拉国，这个坐落在南亚次大陆孟加拉湾入海口面积仅相当于中国辽宁省的三角洲平原国家，历史上就因“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孟加拉语里“糖”“茶”和“荔枝”的发音与中国有着明显的渊源。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是文字记录中孟交流的第一部著作。玄奘西游曾到达过孟加拉地区。孟加拉的阿底侠尊者在西藏生活17年，对西藏的佛教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部中印、中孟交流的历史画卷中，泰戈尔就是一个重要的友谊桥梁。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发表著名论文《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严厉谴责英国在中

<sup>①</sup> 姜景奎：《中国学者论泰戈尔》（上下卷），阳光出版社2011年版，第856-857页。

<sup>②</sup> 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总序》，《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第104页。

国倾销鸦片。1916年，泰戈尔访日期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山东的恶劣行径。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中国的朋友为他的生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著名学者梁启超还为他起了中国名字“竺震旦”。为加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理解和互动，泰戈尔在和平乡一手创建的国际大学中专门开设了“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届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泰戈尔热情赞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精神，使中国人民无私地钟爱万物，热爱人世的一切；赋予他们善良谦和的秉性，……他们本能地抓住了事物的韵律的奥秘，即情感表现的奥秘，……我羡慕他们，但愿印度人民能分享这份礼品。”<sup>①</sup>在这次讲话中，泰戈尔也提到他建立国际大学的初衷，即他对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的看法：“差异永远不会消除，没有差异，生命反倒羸弱。让所有种族保持各自的特质，汇合于鲜活的统一之中，而不是僵死的单一之中。”<sup>②</sup>

季羨林先生也说：“泰戈尔和中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一生的活动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亲身访问过中国，也曾邀请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访问，从而促进了两国人们的相互了解。这种相互的访问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sup>③</sup>

作为对印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都很重要的作家，泰戈尔是这两个国家国歌的创作者，在两个国家人民的心中都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围绕泰戈尔中国和印度、孟加拉国也联合举办了多次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泰戈尔的思想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相关性和重要的价值。希望今后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推进泰戈尔的学术史研究，借此推动中印、中孟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最终为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孙喜勤]

---

① 泰戈尔著，白开元译：《中国和印度》（第二十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② 同上，第446页。

③ 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五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